

那些年 情依何处



——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

章太炎 | 梁启超 | 胡适 | 鲁迅 | 徐志摩
郁达夫 | 王国维 | 周作人 | 沈从文 | 苏曼殊

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打捞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历史教科书上不可能有的民国传奇】

还原一段段精彩的人生——

如易中天一般幽默，跟当年明月一般犀利，同袁腾飞一般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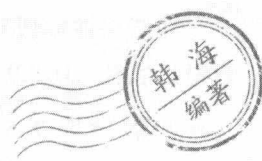
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
抚摸历史，我们找寻一种看人看世界的新视角。

台海出版社

K820.6
20142

P1

那些年 情依何处



——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



章太炎 | 梁启超 | 胡适 | 鲁迅 | 徐志摩
郁达夫 | 王国维 | 周作人 | 沈从文 | 苏曼殊

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打捞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历史教科书上不可能有的民国传奇】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年情依何处: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 / 韩海编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68-0272-4

I. ①那… II. ①韩…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
-民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201744号

那些年情依何处: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

编 著:韩 海

责任编辑:王 萍

装帧设计:吴小敏

责任校对:罗 金

版式设计:通联图文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70千字 印 张:16.5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0272-4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很久以来，一直对近代变幻莫测的民国时期的众多名人、大师们的人生感到困惑，不知道他们的一生究竟怎么样发展的。他们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又如何成名？他们和哪些人是朋友，又和哪些人交恶？他们和哪些人是一派，又和哪些人是敌人或对手？他们喜欢什么，又痛恨什么？他们在历史事件里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些？……对这些问题，我曾经找遍群书，却只见得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录，而没有看到一本系统讲述这一群大师、名流们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著作，民国的人物和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最后依然好像是夜空里的群星，看起来那么不相干地孤傲地闪烁着光芒，吸引着我去探索。

从2012年9月着手创作这部专门讲述民国文坛人际纠葛的图书至今，本人购买和借阅了近百本参考资料，查看资料逾千万字。其中，为了彻底全面地了解胡适，于2012年年底购买的一本由朱洪教授著作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大传（上、下卷）》就达100多万字，并且将其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看了有三遍之多。

不仅查找资料是一项令人头疼的事情，即使是如何把这些人物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如何安排书中的章节等问题，也颇费周折。三思之后，决定将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王国维、苏曼殊、周作人十位在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社会公认的文坛大才子，作为最典型的人物进行梳理，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民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文化精英们的发展变化与人情脉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本书的名字中“恩怨纠葛”四字成为了一种广义的“恩怨纠葛”。因为这些文化精英作为当时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喊出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他们的爱恨情仇也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将他们集中起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发生在他们个人、家庭间的“恩怨

纠葛”，无形中也影响、投射和扩大到了政见纷争、文化派系之争，以及对列强的仇恨等广阔的时代大层面上。

本书为了最深入、最系统地呈现才子们的成长、成才、成名过程中的境遇与遭遇，家仇与国恨，私情与幽怨，交游与交际，默契与分歧，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本书特将人物进行分开阐述，虽然是分开阐述，但本书重点仍是放在人物之间关系的考察，因此人物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内在的联系，读者只有在阅读了全书之后，才能够对那个时代、那个群体有个整体而清晰的认识。另外，在本书的叙述方式方面，则以真实为第一准则，文艺创作为第二准则，力图打造出一部民国历史、文学爱好者认识、考察、研究民国社会的参考书，故而对于一些传闻之类的事情或避开不谈，或保持最低调求证的手法加以处理。最后，在对人物的评价、褒贬的倾向上，也尽量保持以最质朴的态度来对待，只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依靠自身去鉴别和认清其中的真伪、善恶、美丑、优劣等。

尽管本书篇幅不长，选择的传主不多，但文字之间却涉及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名流，读者可以以这些传主去对照那些在书中出现的，只是点到为止的其他人物，如叶圣陶、陶希圣、李公朴、罗隆基、康有为、孙中山等同样声名显赫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名人，从而通过对本书传主的了解，观一叶而知秋，深刻领会本书所要传递的深层次信息。

目 录

梁启超：风雨如晦，走向共和	1
1. 英才出处	1
2. 梁启超与康有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2
3. 梁启超与他的爱徒蔡锷	10
4.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恩怨情仇	11
5. 梁启超的两次论战	15
6. 梁启超之死	16
章太炎：肩头伊尹谁能任，脚底鸱夷未了心	19
1. 不一样的家世与师出名门	19
2. “七被追捕，三人牢狱”的革命之路	22
3. “同志”间的恩怨	25
4. 章门弟子	30
5. “湘女多情，鄂女多音”	37
6. 亦儒亦侠，章太炎的“喜怒哀乐”	39
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41
1. 少年乡谊与兄弟情	41
2. 鲁迅与至交知己许寿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48
3. 鲁迅与范爱农的纠葛	50
4. 烈火青春：瞿秋白、方志敏、郁达夫与鲁迅	52
5. 鲁迅与他的日本朋友	59
6. “横眉冷对”，鲁迅笔下的黑名单里都有谁	62

7. 孺子牛,俯首甘为谁? 74
8. 命里红颜 95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99

1. “激扬文字”的学习与交游 99
2. 批评与被批评:校园学术争锋 101
3. 批评与被批评:与胡博士进行学术争论 102
4. 不想做官的胡博士的政治观与政治“试水” 104
5. 胡适的为人处世哲学 110
6. 胡适的爱恋 117

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126

1. 多灾又多难的苦命人 126
2. 郁达夫与“左联”的纠葛 128
3. 与郁达夫做朋友 131
4. 郁达夫的情场恩怨 138
5. 郁达夫生前轶事 141
6. 寻找郁达夫遗骨 143

徐志摩:来去悄悄,不带走一片云彩 146

1. 家世、朋友与名师 146
2. 多情才子的惊世爱情 150
3. 徐志摩与他的文友 154

沈从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162

1. 凤凰情未了 162
2. 一个在虚弱贫困中坚持的著名“北漂” 165
3. 远离政治的漩涡 167
4. 上海奇遇:小学生到大学教授 168

5. 在武汉的进退	169
6. 如愿以偿:山东真是个好地方	170
7. 昆明的风云	171
8. 沈从文与丁玲	172
9. 聚少离多、命运多舛的兄弟姊妹	181
10. 可怜的九妹	183
11. 得之不易的爱情	184

王国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187

1. 从小就是“老实人”	187
2. “悲惨的”科考之路	190
3. “悲怨的”家庭境遇	191
4. “受不了”的多事之秋	194
5. “悲观的”人生哲学	201
6. 王国维的治学与交游	203

苏曼殊: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207

1. 不幸的身世	207
2. “诗僧”、“画僧”、“革命僧”	210
3. 以情求道,痴僧原来一情种	214
4. 佛理、人情与癖好	217

周作人: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225

1. 周作人与大哥的相依为命	225
2. 两兄弟决裂的前前后后	229
3. 周作人的生平好友	234
4. 周作人的情感轶事	240
5. 周作人当汉奸始末	246
6. 周作人晚年生活	250

梁启超：

风雨如晦，走向共和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初出茅庐、年轻有为的梁启超，在政治界、思想界、教育界、史学界和文学界迅速展露锋芒，一跃成为在近代中国家喻户晓、举世瞩目的戊戌变法著名领袖之一，举世公认的旷世才子。

1. 英才出处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一耕读之家。其家世代务农，到其祖父梁维清“始肆志于学”，成了一名秀才。

梁维清两岁时母亲去世，除他之外，其他兄弟七人，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兄弟分家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得一些家产，但梁维清却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梁维清一生热心公益，常为贫苦人家进行义诊。

梁维清也曾希望几个儿子能够博取功名，但即使连他最钟爱的幼子（他的第三子、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于是，他便把希望寄托在孙子的身上。而在一群儿孙中，梁维清最疼爱梁启超，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两岁时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梁启超在跟

祖父和父亲一起生活、学习的19年里，不仅从祖父那里学到了书本知识，还深受祖父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

1884年，年仅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考后便考中秀才，广东省学政叶大焯惊异之下，把梁启超等几个童子秀才找来面试。叶大焯对聪明灵机的梁启超特别喜爱。在梁启超的主动要求下，叶大焯还为梁启超的祖父提笔写了一篇祝寿文。在文中，叶大焯盛赞梁家教子有方，梁启超聪颖智慧，前途不可限量。当梁启超带着主考的这篇祝寿文回到老家后，梁维清喜极而泣，把这张祝寿文在家中高高地悬挂起来。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虽然没有中秀才，但也是一位饱读之士，在梁维清病倒后，教梁启超读书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梁宝瑛为人正直、中规中矩，对梁启超管束一直很严。梁启超的母亲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其人知书达理，对梁启超也管束很严。她一共生有四子两女，梁启超是长子。她在生最后一个儿子时，因难产去世。

1889年，梁启超考中举人。1890年，赴京参加会试，未中。1895年，参加会试再次落榜，此后，他便放弃了科举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变法大业。



梁启超

2. 梁启超与康有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梁启超一生多处于政治社会大变迁的风口浪尖，是时代变化的第一参与者和见证人，一生交友甚广，树敌也多。

1890年春，在同学的引荐下，年仅17岁便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的梁启超拜已32岁还未中举的监生、“南海先生”康有为为师，一时间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引得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很快便“人满为患”。为什么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还要拜仅仅是监生的康有为为师呢？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康有为的“有为”二字。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银塘乡的一个官宦世家。康家世代在官府做事，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

为士人十三世矣”。康有为高祖康辉，曾官拜广西布政使，诰封荣禄大夫；曾祖康式鹏曾于乡里讲学；祖父康赞修曾任连州教谕，亦为一方名士；叔祖康国器官至广西巡抚；父亲康达初曾为江西知县候补。

康有为是家中长子，6岁时师从简凤仪，7岁时就能作文，一时被乡人称为“神童”。但康有为却并不以此为傲，而以圣人为榜样，不苟言笑作老成状，故而亲友送了他一个“圣人为”的雅号。

11岁时，因为父亲康达初去世，康有为便到了连州跟祖父康赞修读书。在祖父的悉心培养下，康有为诗词文章大有长进。3年后，回乡自学，博览家族中的藏书。

尽管康有为自幼聪颖努力，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31岁之前，屡次乡试不中。

19岁时，康有为娶妻张氏，同年祖父去世。此后，康有为决心暂时谢绝科举，而投入粤中大儒朱次琦（1807年—1881年，人称“九江先生”）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

朱次琦对康有为的影响很大——康有为自述其“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康有为也因为藐视韩愈等文坛星宿而被同学们呼为“狂生”。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后，在西樵山白云洞独自读书养性，静坐自悟。不久，翰林院编修张延秋同几位文友游西樵山时，与衣履不整而傲气十足的康有为发生了争论，不过争论归争论，彼此都对对方还是很欣赏的。张延秋回去后，逢人便夸康有为是一位谈吐不凡的“异人”。康有为也写了信给张延秋，从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通过张延秋，康有为开始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优于封建社会的地方，开始把目光投向西学。据说康有为曾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

1890年初，康有为举家迁到广州，在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后，开始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在廖平的启发下，康有为后来完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的两部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维新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光绪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乡试的机会,以荫生(荫生是国子监的学生的一种称呼,国子监的贡生和监生可以直接为官,荫生主要是为了照顾高级官员的子孙而设的)的资格向光绪帝上了一份奏折。不过这份奏折因为受阻,不仅未能送到光绪手中,康有为还为此而遭到了他人的痛斥。

1890年,康有为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为传道授业筹办学校。

陈千秋(1869年—1895年)闻讯后,因为敬佩康有为渊博的学识与敢于上书直谏皇帝的气魄,立即退出学海堂,第一个拜入康有为的门下。不久,陈千秋介绍了学海堂的同窗、在上一年就已经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过来听讲。梁启超在听了康有为的史学西学等闻所未闻之见解、学说后,“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于是毅然拜康有为为师。

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带动下,徐勤等有志青年纷纷而来,以至于康有为为连续两次将学堂搬迁以容纳骤增的人数。最后,学堂迁至广州“万木草堂”,一时间“万木草堂”“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康有为也因而名声鹊起。

康有为的讲学与办学很有特色,为维新变法培养了很多骨干和中坚力量。

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讲课时,“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歔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

在办学上,康有为眼光先进。他让学生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史学、政治与自然科学等知识。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还开设了体操、舞蹈、射击等课程。

1895年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赴京参加会试。不久,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震惊。康有为在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鼓动广东、湖南等18个省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康有为被大家公推起草奏稿。康有为遂以“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上了一份万言书给光绪皇帝以挽救国难,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然而,这次上书又因为受阻而未能到光绪手中。但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据说,康有为中进士,还是因为主考官徐桐的一个“误会”。徐桐等人因为极端保守,很不喜欢康有为这样爱出风头、叛逆味道十足的人,因此他告

诚阅卷大臣，广东试卷中最有才气的定是康有为，一定不能录取。于是，梁启超因为一篇才气横溢的试卷而名落孙山，康有为却中了进士，成为工部主事。

1895年5月，康有为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书光绪，向光绪帝提出了更为完善的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变法图强四大方案。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光绪看后龙颜大悦，当即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然而，各省督抚对变法毫不积极，征求意见也不了了之。

康有为在上书后一个月，再次给光绪皇帝上书，但工部主事无权直接上奏皇帝，上书最后遭到工部堂官的拒绝。但康有为此时的变法思想已经初成体系，为了使变法得到更多的支持，康有为与陈炽、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于是年8月，在北京创办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份维新报刊——《万国公报》双日刊，由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等人担任编辑，主要宣传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和社会制度，并着重阐发康有为的变法思想。

被称为是“西学新知之总荟”的《万国公报》刊行后，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成为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万国公报》不仅影响了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林语堂等一大批人，它还是最早把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介绍到中国的媒体。

是年9月，在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的支持下，康有为与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

11月，康有为在拜访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后，在他们的支持下，与梁鼎芬、汪康年、张謇、黄遵宪等又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并于次年1月创刊《强学报》，以倡导维新变法主张。

1897年11月，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在上书中详尽开列了变法内容。不久，都察院的高燮曾为康有为上了第一个奏荐折，请光绪召见康有为。当光绪准备召见康有为时，却遭到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因为按祖宗惯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代为接见问话。

1898年1月，康有为被邀请到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几个大臣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著名的辩论。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很想亲自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的官吏为由加以阻挠，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趁热打铁，又接连两次上奏，使光绪推行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4月，康有为组织成立了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孔）教之不失”为宗旨的保国会。

但保守派怀疑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极力反对，不久保国会即停止活动。

6月，光绪皇帝下定决心，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五天后，光绪打破“祖宗家法”，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光绪本欲重用康有为，但终因旧守势力太大，只好委屈康有为做了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准予专折奏事。

9月初，宫变前夕，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谋划政变，以拯救变法运动。但光绪帝深知自己毫无实权，变法失败已成定局，于是降旨以命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为由，安排他立即逃离北京。同时，又让林旭带密旨给康有为，让他韬光养晦，将来再图报国。康有为接到密诏后悲愤莫名，立即找来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谋划救皇之策。当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又欲以江湖侠士大刀王五等人冒死救主，还去求见伊藤博文，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出面来阻止慈禧废立光绪帝，但是均告失败。无奈之下，康有为于京师发生政变的前一日，出京逃走。维新变法以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遇难的惨痛失败而告终。

遭到通缉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辗转逃亡到了日本。到日本后，康有为继续从事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不久，同样在日本流亡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找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希望一起合作推翻清政府。但受过光绪“衣带密诏”的康有为认为，自己“受恩深重”，只希望救出光绪，继续推行变法以挽救中国，其他都不予考虑而拒绝合作。

1899年3月，康有为前往英国、加拿大等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外交的努力来获得列强的支持，一方面筹建保皇会。保皇会宣称自己“名为保皇，实

则革命”，致使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发展很快，几个月的时间，人员就以万计。一时间，保皇党与兴中会等革命党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

1900年，康有为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趁着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天下大乱之际，动员了一切力量，准备兴师勤王，一举成功，可惜又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之后，保皇会趋向瓦解，康有为也陷入苦闷之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面游历在香港、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的山水风光之间，一面著书写作，继续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其思想开始跟不上革命主流的发展，而成为了革命的绊脚石。但是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始逐渐转向革命排满。康有为自然成为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对于弟子梁启超的变化，康有为多次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后，二人终因政见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康有为则咒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二人从此貌合神离，关系公开恶化。

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希望清政府能够允许他回国，“共建大业”。民国成立后，康有为站在民国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民主共和。

1913年冬，康有为结束了海外16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并出任孔教会会长，同时积极协助张勋的复辟活动，要将孔教定为国教。

1919年，康有为通电支持“五·四”运动，指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

1927年，康有为为表示自己仍忠于“朝廷”，特地赶到天津“觐见”溥仪。是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于青岛，享年70岁。

康有为死后，世人对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巨人”与“侏儒”之争。

康有为一生的表现颇受人争议，这不仅是因为他后来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还因为他的一些所作所为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动机和人格，也被人认为是一个争名好利、急功近利的表里不一之徒，甚至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他成了历史的“侏儒”。

1888年，康有为在京参加乡试时，为求上书变法，曾阿谀奉承、巴结京城众多权贵，结果因为表现得实在过度，而引起权贵们的反感，都觉得他“托名西学，希图利禄”。

强学会成立后，一时不少权贵给予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捐钱赞助强学会。但康有为暗自认为张之洞、丁日昌等不过是想“藉以渔利”而已。而对于支持变法，捐了钱的商贾如经元善、郑观应，康有为则规定他们不能参与强学会的事务。尽管如此，郑观应等依然支持他的变法运动，甚至在变法失败后，还接济、保护他的家人和朋友。不过随着变法的“过时”，最终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抛弃了这位“圣人”。

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收罗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攻击革命党推翻清朝，还和一些大地主、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一部分军阀，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思潮、新教育。康有为将共和看作是“破法律，弃礼教”，“恣睢放荡”的“暴民”之举，将民国政府推行的新式教育，“拟为洪水猛兽”。在尊孔复古、反对新式教育的活动中，康有为立即以精神领袖面目粉墨登场。在陈焕章等人的策划下，孔教会又是“请愿”，又是“上书”，政界如黎元洪、冯国璋等要员也积极响应。于是，孔教会、国教维持会、孔社、孔道会、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孔子诞辰纪念会等一些守旧的文化组织纷纷出笼，这些尊孔活动，实际上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策应与社会策应，而事实上，一心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曾多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

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不久，梁启超就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复辟帝制的阴谋，毅然与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决裂，同时命弟子蔡锷回云南发起护国运动。梁启超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跌落为历史的“侏儒”了。

对于康有为的行为风格，他的弟子陆乃翔与陆登骅在《康南海先生传》一书中说：“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议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这其中的一些论述或者可以说是一面之词，但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康有为一生共娶了六位太太（张云珠、梁随

觉、何旃理、市冈鹤子、廖定徵、张光)，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是后话。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以后，一方面开始涉足政治，另外一方面也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梁启超曾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到日本。起初，梁启超一如既往地惟师命之是从，继续跟着康有为宣传保皇主张。但渐渐地，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梁启超的思想不断进步，最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并且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密切来往，最后达成了组党的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去颐养晚年。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举动非常生气，严斥其倾向革命。

1902年，经黄遵宪、严复等好友的开导，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批驳康有为的尊孔保教主张，认为从今以后，只有保国而已，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实行共和制还是立宪制等重大问题上，康、梁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大。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利用康有为，支持他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本欲复辟清朝的康有为才恍然大悟，于是加入讨袁战争。

但与康有为反对共和相反，梁启超一开始便坚决维护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一方面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抗衡，另一方面则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进行抨击，还联合蔡锷等人，以武力讨伐。云南宣布独立后，梁启超又只身前往督促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

然而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不久，康有为又协助张勋搞了一次复辟。这次，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着头品顶戴。但帽子只戴了12天，复辟就失败了，康有为本人遭到通缉，直到1918年才被北洋政府特赦。

在张勋这次复辟中，梁启超支持段祺瑞进行武力讨伐，为段祺瑞起草讨逆宣言，并且以个人名义发文斥责康有为书生无知。康有为则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将他看作为吃父母的“鸱枭”和“獍”，背恩忘义、射杀了师父后羿的逢蒙一类。

康、梁二人公开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1927年，康有为70岁